

Johnathan Farris, *Enclave to Urbanity: Canton, Foreigners, and Architecture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257pp.

潘博成\*

Johnathan Andrew Farris 教授任教於香港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SCAD Hong Kong），主要研究方向為建築史。通覽其學術著述，港口城市（廣州）、西洋建築和跨文化交流是作者研究領域的三個核心關鍵詞。作者首部專書《成為都市性飛地：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廣州、外國人與建築》（以下簡稱「本書」）放在文化史和建築史的學術脈絡，集中展示對上述關鍵詞之思辨。誠如香港大學出版社對本書的評論：「英文世界首部調查廣州的建築與城市地景如何形構西方貿易者與傳教士群體，與城市內占主導的中國居民之間的關係」，本書學術重要性之一即是區別於既有相關研究，<sup>1</sup>以城市建築空間及其再現為視角，釐清了十三行時期至民國初期百餘年間，西方人與廣州人複雜多變以至充滿矛盾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關係。

本書以時間為序，分為五章。第一章以 1850 年代以前的十三行時期為中心，討論西方貿易者與中國行商或中國傭人等社會群體之間，在行館、珠江和廣場等城市空間的關係結構，以及這些社會關係如何影響建築物的設計與使

---

\*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sup>1</sup> 如 Virgil K. Y. Ho, *Understanding Canton: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ichael Tsang-Woon Tsin,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

用。第二章則探討 1860 年（英法聯軍期間）至 1905 年，西方人如何透過沙面（英法租界）、河南（即珠江以南區域，今大致為廣州市海珠區）等城市空間，逐步與當地人劃定邊界，以實現與廣州人的區隔。第三章從旅遊手冊和城市地圖等史料，及時提醒讀者注意，「邊界」並不意味著西方人與廣州人交往徹底中斷。西方人在廣州內城以飲食、購物和旅行等方式，與當地居民保持密切往來，以及持續相互的文化詮釋。若說前三章多以西方人作為觀看主體，第四章則較多從廣州人，特別是民國初期廣州政府官員的視角出發，闡述他們如何利用西方規劃思想與技術，使廣州具有走向現代性的可能。當然，西方貿易者與傳教士仍透過商業建築、慈善機構或教會大學具體影響他們與本地人的關係。結論則跨越至二十世紀後半葉乃至當代的廣州，指出上述包含於城市空間的中西關係，或是受中西關係形構的城市空間，如何綿延影響了此後歷史過程。

表 1 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廣州中西關係的核心地域與基本態勢

說明：根據本書主要觀點整理。

時間段	廣州中西關係核心地域	廣州中西關係基本態勢
十八世紀末以前	十三行、珠江、河南等	空間親密性造成知識與觀念的彼此流動
1860 年代前後	沙面、河南、舊十三行區域等	邊界成型，中西關係充滿緊張感並且因陌生而加劇
十九世紀末	沙面、河南、廣州內城等	在上述基礎上，知識與生活經驗之間的流動，一定程度緩解衝突
二十世紀初	長堤、嶺南大學、市政建築等	中西關係因建築物風格而得以調和

以本書問題意識「建築如何作為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廣州的中西關係變化的框架」（頁 1）總結，作者為讀者提供了兩幅具有學術價值的「動態鳥瞰圖」：廣州中西關係核心地域的變遷圖，以及中西關係基本態勢圖（表 1）。當然，這些變遷是逐步迭加而非彼此更替的過程，衝突與合作並存的協商狀態貫串始終。概言之，中西關係之緩和或緊張，與空間親密性或疏離性相關，相

對親密的空間交織（如中國侍從與西方商人的共居、或雙方的社會交際場合）可使個人知識保持流動；而空間的疏離感（如沙面與廣州內城的界限愈發森嚴）會導致彼此有效交際減少，西方人出於戒備心態的防禦與隔離，非但不利於他們的安全，還會加劇廣州人的怨恨情緒（頁 232-233）。

在評述概念與史料使用的優點前，必須肯定本書在寫作視角與主旨的學術價值。「飛地」（enclave）作為人文地理學概念，被作者挪用至歷史研究。確切地說，“enclave”是「內飛地」之意，即沙面或河南乃廣州的內飛地。它是以廣州人為論述視角，觀看作為「飛地」的西方人活動空間，如何影響廣州本身。與“enclave”緊密相關的是「外飛地」（exclave）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對反於「內飛地」，乃基於西方國家視角，表明在廣州擁有一塊遠離國土的所有地。儘管本書並未提供上述背景，但已將「內」、「外」兩種飛地視角融合於論述，並最終落腳於「飛地」的空間屬性。另一方面，“urbanity”至少有兩重含意，「都市性」是其一：廣州都市性如何因西方人出現而變化，至民國之初，西方都市性如何轉換成為廣州官方追求的都市現代性；「雅緻」或「富有禮儀」則是“urbanity”的深層含意：「都市性」偏重城市空間層次，而「禮儀」更多是文化交往層次。它強調的是中西跨文化交流中，彼此在觀念、知識或文化上的認同、競逐或矛盾。就學術脈絡而言，上述思路使本書較成功地糅合了建築史與文化史的城市史研究，精彩呈現了城市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互動結構。

其次，「廣州人」（中國人）與「西方人」不是兩個單數概念（頁 1 註 3）。作者有意凸顯其內部複雜性，而避免簡化中西的跨文化關係。以十三行時期為例，儘管中國行商、侍從與西方貿易者具有友善親密的居住空間關係，但廣州人對西方人的凝視圍觀，或廣州官員於新中國街（New Chinese Street）築起的柵欄，都造成了當地人與西方貿易者的隔閡。雙方的緩衝帶不在陸地而在珠江，廣州一方的調和者是水上的蜑民，他們長期不受官方重視，反而使他們與西方貿易者在娛樂（如飲食、娼妓等）等方面可以自由交往，成為緩解中國官方與西方貿易者緊張關係的渠道（頁 43-45）。換言之，珠江不僅是河道以及

廣州河南與河北的分割線，也因為蜑民的活躍而成爲西方貿易者重要的娛樂空間。

此外，作者也細緻考慮英（法）與美國等不同國別的西方人，對廣州城市空間的影響，以及廣州人如何區別看待他們。首先可以確認，即便充滿仇外情緒的廣州本地人，依然能夠在「西方人」之內區分交戰國（如英國）或中立國（如美國）的國民或財產（頁 233）。這再次印證了相互的知識（mutual knowledge）對中西關係的重要意義。不同西方國家對廣州城市空間的利用方式，也會左右廣州人對不同西方國家的態度。美國在廣州的租界（American concession）或商行計劃設址於舊十三行區，明顯試圖與具有侵略性的英國人保持一定距離。相比之下，英國領事衙門則租用位於廣州將軍府衙門，以維持其在廣州內城的權力影響力（頁 99-105）。

本書的史料與分析思路亦有精彩之處。文書檔案以外，作者根據各個歷史分期，側重徵引與分析了水粉畫、室內平面圖、旅行手冊（地圖）和圖像。從研究路徑而論，作者試圖於文化史路徑下的圖像史（「以圖證史」），與藝術史路徑之間靈活轉換，透過圖像分析提供文書檔案不易呈現的微觀史料，如十三行時期，洋行建築立面的變遷與延續性（頁 15-18），或石室天主堂與嶺南大學校園建築的中西融合經過（頁 132、208）。另一方面，利用圖像的內容與形式分析，理解西方人對廣州的觀看視角與意義詮釋，如對西方人繪製的廣州城市圖的內容與形式比較分析（頁 167-171）。此外，本書對十九世紀末西方人的廣州旅行手冊的分析亦屬精妙。透過內容比較，我們得以確認各旅遊手冊的資訊來源（作者親身觀察、沿用舊版手冊等）、編制意圖（酒店廣告、風景指南、購物索引等）、展示對象的差異（偏重/少談何類景觀、必買物產/必遊地差別等）。更重要的是，旅行手冊的觀念與意義詮釋是西方旅行者的知識背景與思考框架，使他們以此觀看廣州或與廣州人交往，造成諸如「如何避免被廣州人圍觀」、在宗教場所比較中國歷史與西方文明等旅行策略或習慣性思維（頁 172-189）。

然而，儘管具有上述種種優點，但本書仍有可商榷之處。首先，個別「想當然」的文化推論依然存在，如將 1949 年以後廣州新建的九層公共住宅，與中國人對數字「九」的熱衷相聯繫（頁 228）。據筆者經驗，此時期廣州公共住宅層數尚有三或四等其他層數。更重要者，決定住宅層數的關鍵是居民態度、經濟成本（效益）以及土地利用等具體因素。<sup>2</sup>此外，本書指涉十三行時混用“Shisan Hang”與“Thirteen Factories”，也增添不必要的閱讀轉換。

但本書最大的遺憾，可能是史料的視野局限。儘管上文充分肯定其史料之豐富性與分析之精妙，但通覽全書不難發現，由中國人（廣州人）生產的史料甚為罕見。以下試舉兩例以期深化該研究主題。

在十三行時期，除西方人繪製水粉畫外，廣州工匠大量製作的通草畫（外銷畫）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的文化詮釋功能。這些通草畫看似不以西方人在廣州的活動空間為主題，但以西方人為主要觀眾的通草畫，已包含大量西方人如何理解廣州，以及廣州工匠如何詮釋並滿足西方人對廣州之趣味的資訊。以建築主題通草畫為例，廣州官府衙門是普遍主題，<sup>3</sup>它可視作西方人對於當時尚無法進入的廣州城市空間的好奇心態。由此可與本書大量探討的洋行主題水粉畫對話：西方人不僅在洋行建築的材料或立面設計中整合兩種文化，這些實踐背後的動機，正如通草畫所展現的，一定程度上是他們對中國建築好奇心態的表徵。此外，即便是廣州城市圖，本書以十三行為視野中心的思路，容易忽視「未被繪製」的城市空間，或西方人不以十三行為中心的繪畫。譬如，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便出現過多款畫面結構相近的，由河南望向河北廣州內城的水粉畫。<sup>4</sup>十三行區域透過透視比例被放大，但內城區域依然包含

<sup>2</sup> 可參見華攬洪著，李穎譯，華崇民編校，《重建中國：城市規劃 30 年（1949-197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 141。

<sup>3</sup> 相關圖像可見王次澄，吳芳思，宋家鈺，盧慶濱等編著，《大英圖書館特藏中國清代外銷畫精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其中，第 3、5、6 卷分別輯錄了廣州官府衙門建築、潘有度與劉進士宅第園林、海幢寺、珠江船舶與江河風景等主題之外銷畫。

<sup>4</sup> 可參見：Patrick Conner, *The Hongs of Canton: 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 As Seen in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 (London: English Art Books, 2009).

大量細節：比如突出表現鎮海樓、花塔和城牆，密佈大量船艇的珠江河岸（如海珠砲台一帶）等，都是西方人觀看十三行區域之外廣州的重要視覺史料。我們或可藉此進一步探尋，西方人對廣州的早期印象，如何影響十九世紀末廣州旅行手冊或地圖的形成。

相對於十三行時期史料的遺漏之憾，對十九世紀末廣州旅行地圖的討論，則存在較大疏漏。本書已留意到旅行手冊或地圖，對西方旅行者漫步廣州內城時的重要用途，且有意比較了 *The Tourist's Guide to Canton, the West River, and Macao* (1895) 或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1875) 等旅行手冊對地標所增加的文字描述，但作者並未注意到西方人繪製的地圖對廣州人的影響。從地圖篇幅而言，1857年 *Plan of the Attack and Bombardment of Canton* 出現之前，中國人製作的以廣州內城為中心的地圖，並未見到等比例展示西關、東關與河南區域，而西方地圖所以呈現西關與河南區域，因為這些區域是他們在廣州的活動中心。但至清同治十年（1871）《番禺縣志》的〈捕屬圖〉和清宣統二年（1910）《續修南海縣志》之〈縣治附省全圖〉，已普遍採用西方人呈現的廣州城市範圍，河南和西關被大幅納入地圖中。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西方地圖的廣州城市空間已趨於一致。換言之，作為西方人「飛地」的廣州城市空間，在一個多世紀的建設後，已被廣州人（甚至廣州官方）視為自身的城市範圍。爾後這些「飛地」也將成為民國廣州官員追逐都市現代性的重要依據與象徵。本書所缺乏的，正是這一歷史過程之始，以及西方人在廣州城市空間意象定型中的作用。

何傑堯（Virgil K. Y. Ho）探討民國時期廣州大眾文化時，提出事實（realities）以及對事實的認知（perceptions of realities）兩個研究層次，意在說明民國時期廣州的都市性，不僅體現在建築空間本身，也取決於人們對這些「事實」的認知、經驗、情緒或感情。<sup>5</sup>他以沙面建築為例，說明廣州人對外

---

<sup>5</sup> Virgil K. Y. Ho, *Understanding Canton: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p. 1.

國人的矛盾情緒，一方面視之為恥辱的殖民空間；另一方面卻又視之為現代性象徵。同時，不同社會群體又有著各自詮釋，如富人視之如潔淨文明之地，蜚民則認為當中充滿商機。這種矛盾心態與當時嶺南大學學生的內心鴻溝相似：一方面接受西方教育中的民主、現代和正義等觀念；另一方面卻要面對同為西方背景的外國人特權現象（頁 226）。這是包括廣州人在內，近世中國人在探尋都市現代性時，難以迴避卻又不易釋懷的內心「飛地」。就歷史研究的延續性觀之，這些「飛地」的影響確如本書結論所言，綿延至民國或 1949 年以後。由中西跨文化關係累積的交往遺產，在此後不同政權下的廣州將如何發揮作用，則可作為繼續研究的視野。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也值得從事民國時期至晚近廣州城市史的研究者閱讀。